

发展教育与生活方式现代化

唐 小 华

将教育与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作动态的考察,虽称不上是一个全新的观点,但却是一个颇具现实意义的课题。

教育是按照一定的目的要求,对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诸方面施以影响的一种有计划的活动。教育,广义上泛指社会中一切有教育作用的活动,等同于社会教育;狭义上特指学校教育制度。生活方式是人们生活活动典型形式的总和。生活方式,作为一个综合体,学术界对其定义多种多样。苏联社会学家伊·谢康将其简括为“人们个人(团体)的生活和活动的固定形式。”^①我国学者宋林飞则又具体解说为“获得与消费生活资料(包括劳务),支配自由时间与日常生活活动的固定形式与典型特征的总和。”^②有的学者还进一步将生活方式分解为劳动生活方式、消费生活方式、政治生活方式、精神生活方式、社区生活方式、闲暇生活方式、家庭生活方式等形式加以研究,将其视为测量和反映一定社会文明程度的综合指示器。

教育无论是作为一种活动,还是作为一种制度,都对社会生活方式产生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人们现实的生活理想、生活水平、生活质量、生活风格、生活来源都这样那样地折射着社会教育的光泽。因此,教育与生活方式之间是一种互动关系。若从教育现状入手,就能生动地反映生活方式的状况;若从生活方式发展的需要着眼,则可以清晰地洞察教育未来的走向。本文正是基于此,力求准确地把握我国教育与生活方式的现状,并预测二者未来发展的基本趋势。

—

应当客观地承认,我国的教育现状是不理想的,我国人民生活方式离现代化还有较大差距。

教育需求是人类发展的一种高级需要。一个国家对这种需要的迫切程度及满足水平,可以通过对该国教育投入量作准确的定量分析。而这方面投入的具体方式又分为社会投入和个人投入两种。在我国,由于社会劳动生产率不高,加之人口众多,为了维护广大劳动者享有普遍受教育的权利,人们接受社会教育的需要主要是通过社会公共消费的方式来满足的。社会投入占整个国家教育投入的绝大多数。国家每年度的教育经费拨款是维持整个社会教育事业最主要的财源。这一投入方式既为扩大教育面提供了可能,又决定了一定时期投入总量的有限性。据报道,1989年度国家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了399.7亿元,占当年财政支出比重的12.39%。另外,社会捐资办学的经费35.8亿元。两项合计,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2.76%,国民收入的3.32%^③。国家

为维持这一水平已作出了相当大的努力,可仍然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对教育的需求,远远低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在全球150多个国家中,我国的教育投资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一直在130位左右徘徊^④。占世界1/5的人口,却分摊着全世界1/30左右的教育经费(人均不足40元)。因此,造成了许多教育机构把工作重点放在生财之道上,以弥补国家拨款的严重不足;造成了全国范围分配中普遍存在的体脑倒挂现象,造成了教学设施、教学手段、图书情报等的陈旧落后……。

与此相应,我国社会对教育的个人投入量也是很少的。据统计,1980—1985年间,我国居民家庭平均教育费用支出仅占总支出的1%,而同期美国家庭此项支出所占比例为8%,即使许多发展中国家也都远高于我国^⑤。近几年,许多家庭都在“惊呼”家庭教育支出上升,可实际水平仍未突破平均2%。可是,同期我国居民用于烟、酒、茶等纯嗜好性消费品的开支,却为总支出的5.3%,并不断增加^⑥。二者之间的反差之大令人触目惊心。尤其是在占人口总数80%的农村,这种反差更为突出。社会舆论有的在赞扬烟、酒业对国家的贡献,有的从健康角度诅咒“世界第一杀手”在中国肆虐。我以为更重要的应以此为例,对我们现实的生活方式加以检讨、剖析。

造成我国目前教育事业社会投入、个人投入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客观方面看,主要是受制于两个因素。

其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实的生产力水平。马克思早就说过“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人们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过程。”^⑦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一方面决定了国家无力筹措更大量的资金用于教育。在生存与发展的选择中,只能相互兼顾,首先保障人民最基本的生存权。根据《1991年中国统计年鉴》,至1990年仍有1117万城镇人口人均月收入低于50元,有11023万农村人口年收入少于300元,处于未脱贫状态^⑧。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到社会生产、再生产领域,是目前我国加速实现社会工业化、现代化的唯一选择。另一方面,也限制了人们对知识的渴求程度。据专家测定,我国经济平均增长速度虽然较快,但75.07%来自资本投入,19.47%来自劳动投入,只有5.46%来自生产率的增长^⑨。人们的经验感受也与此分析相符。在广大农村以及城市相当一部分行业,体力与经验仍是衡量合格劳动者的主要指标。为数众多的文盲人群之所以能在农村存在,关键是由于现实农业生产手工劳动方式的容留。这种落后的生产方式不被淘汰,这部份人群就有存在的必然。

其二,过高的人口增长率,庞大的人口基数。四十年来,我国人口已增加了一倍多,并将在本世纪末接近13亿。即使在普遍实行计划生育的今天,每年仍有1500多万新生人口降生,超过了澳大利亚全国人口的总数。这就使得教育投资增长速度大受影响。每年新增投资从绝对量上看相当可观,但相对于庞大的待教育人群,便是杯水车薪、十分匮乏。通过不懈努力,1982年到1990年,全国15岁以上人群中文盲、半文盲比例由22.81%降为15.88%。相对数似乎只减少6.93个百分点,可这意味着近5000万人脱盲。1991年又有548万人脱盲。若每人脱盲费用仅以二十元计,也将高达10亿元之巨。我国大、中、小学在校生数逐年上升,1990年与1985作相比,中等学校在校生增加了1.8倍,初等学校在校生数增长了1.3倍,都高于同期教育经费的增长率。高校学生数的增加虽未如中小学那么快,但国家的投资额最大^⑩。所以,学校教育经费都只能维持在相当低的水平上,并且随着物价上涨而愈显窘迫。

从主观方面看,我们又不得不对社会及个人的生活观念、生活理想作一番检讨。因为人们的社会行为总是与一定的价值取向相联系,并受后者支配的。否则,就难以解释同一经济条件下不同生活方式存在的理由了。在社会意识中,把教育视为消费,把教育机构列入社会消费机构,根深

蒂固,由来已久。教育的社会作用、社会地位远未被真正承认。重经济、轻教育,既有历史原因,又有现实土壤,是一种不可忽视、具有极大市场的社会心理。教育事业长期以来缺乏法律保护。社会投资兴趣不高。集资兴学步履艰难。加上长期以来教育费用国家统包,在相当一部分人中造成了一种错觉,以为教育是社会的责任、国家的事,与个人、家庭无关。工资收入丰富的内涵被简化为一种单纯的物质享受之源。如果说以前人们还可以用愚与贫的结合来解释这类观念,现在也有必要再将认识推进一步。随着“希望工程”的开展,因贫困而失学者在减少,可是在那些率先富起来的地方甚至城市一些阶层中,因富裕而弃学者正在增加。此类信息,屡见报端,发人深思。

二

正视现实,就是为了改变现实。社会发展已对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当我们放眼世界时,便会产生一种紧迫感。

当今时代是科技时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整个社会生产活动中,教育机构承担着特殊的职责。它所产生出的“产品”就是在道德规范、思维技巧、个性品质诸方面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社会实践主体。科学知识为社会各行各业所必需。没有教育,就没有科学,也就没有现代化,这种内在联系已为人们越来越普遍认识。教育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由“潜”到“显”,由“间接”到“直接”,由“慢”到“快”。教育投资所带来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越来越大。据统计,许多发达国家和近年经济起飞的国家,经济增长中至少有一半受惠于技术进步,也可以认为受惠于教育投入。因此,西方经济学在“物的资本”概念运用多年之后,又提出了“人力资本”概念。其间的人力并不是泛指人的体力,而是特指由高等教育机构培训所形成的智力和创造力。他们主张把教育投资称为“人力资本”的积累,并断言这种投入将会获得远远超过“物的资本”的收益。

曾有人对所谓“日本奇迹”表示惊讶。日本一位前首相的回答非常干脆,在他看来这种经济飞跃就是第一流教育的结果。因为在当今时代,并非每一个生命个体都能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文盲、半文盲以及初等教育水平的人,在许多领域已无法介入社会现代化事业,无法成为社会实践的主体。接受良好的教育,已成为涉足社会进步事业的基本条件。在美国,“总的来说,高技术工业部门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员是大学毕业生,在这些大学毕业生中有一半以上是技术专业毕业的。另外三分之一的人员具有大专学历,即在高中毕业以后受过两年或两年以上的教育。”^[1]这还只是美国七十年代末的情况,现在这一比例又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即使已受过一定程度教育的人,仍需要通过不断学习才能维持自己的社会地位、社会价值。“知识之球愈大,则与未知界接触之面也愈大。”^[2]不能及时更新知识,就难免被淘汰。熊映梧教授的《生产力经济学》一书指出,从传统工业生产过渡到现代工业生产,有 40%左右的工人因教育水平限制而面临失业。留用者中 90%以上还必须经过再教育才能胜任工作。事实也是如此。西方国家结构性失业人数增加,传统产业生产企业破产数增加,以及固定资产投资与教育投资比率逐年上升,原因之一,即在于此。科技优势、技术输出不仅是今天西方社会维持丰裕的物质享受、奢侈的生活方式的依托,而且成为剥削发展中国家的一种新手段。而这一切又都是以不断增加本国教育投资,提高教育水平,不断收集他国教育成果——优秀科技人才为基础的。

现代社会是现代人的社会。而现代人并不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是一个社会范畴。每个生命个体的初临人世,都只能算是一个自然人。只有经过长期的社会教育,方能完成由自然人向社会人

的过度,成为一个真正合格的社会成员。社会学将这一漫长的过程称为“社会化”。近代社会以前,社会化过程主要是在家庭中完成的,每一个体只要从父辈那里获得若干生产、生活经验性知识即可承担社会责任。而现在则要由专门的社会职能机构,教育机构来进行,通过系统化教育使受教育者的知识、行为、态度都发生显著变化。如果把教育过程仅作为传授知识的过程,显然太狭隘了。

“教育”这个词在拉丁语中原意为‘引出’。教育即将一个人引出来,把他身上的优点发挥出来,并在对付周围世界的过程中发展自己的能力。”^③中国古代儒家素来就把教育作为“明人伦”的途径。唐代韩愈在《师说》中指出“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美国当代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诺指出教育有五个主要目的:“1. 社会化;2. 社会控制;3. 选择和分配扮演各种社会角色的人;4. 同化新来者和维护亚文化;5. 为社会革新和变化做准备。”^④将教育与人的社会化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具体化。

在现实社会中,教育是具有意识形态性的。每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都是在教育中形成的。特别是科学的世界观,不会自发产生,而只能是社会教育的结果。生活方式素来就是人们世界观、人生观的外部显现。人们需要什么、怎样去满足,综合地反映着其社会化的状况。生活方式中质与量的差别,常常取决于其所受教育的性质及程度。不同的社会阶级、阶层之所以会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可以在他们所接受的不同社会教育中找到原因。美国行为主义心理学家毕生认为是教育造就了人,而不是什么个人的才能、嗜好、趋向、能力、天资和他祖先的种族决定着这个人的面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是资产阶级社会教育的产物。而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建立,离开社会主义教育也是不可能的。对此,我们已有许多经验教训。实践证明,人们受教育的程度与其生活质量成正比,因为受教育越多,人们的创造力就越强,提高物质生活质量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在食物结构、衣着装束、居住条件、交通工具等方面都会有相应的体现。同样,受教育越多,人们的心理素质将越高,提高精神生活质量的可能性随之增大,表现为理想、道德、情操更为高尚、更为丰实,而越轨行为也越少。《世界卫生组织章程·序言》指出:“健康是肉体、精神和社会的康乐和完善状态,而不仅仅指无疾病或无体弱的状态。”人类要实现健康的人生,达到康乐和完善状态,离开教育是不可想象的。

通过对消费方式及闲暇时间支配方式的考察,我们可以对上述关系有更深刻、形象的理解。一个人的消闲方式,说到底就是他对生活的选择。个人的消费量及消费取向、个人的闲暇时间及利用方式,无一不受其教育程度的影响。普通市民与知识分子生活方式、需要层次的差异极生动地体现了这种关系。在同等或相似经济收入情况下,知识分子对于精神生活的满足有着更为迫切的要求。追求知识、追求发展,是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即使牺牲一些物质享受也不愿泯灭自己的精神寄托。就是在生活处于比较清苦的条件下,个人支出或家庭支出中,用于求知、教育子女的费用总占据相当份额,高于其它收入相等甚至更高的社会阶层。对于普通市民来说,闲暇时间的利用多是消遣型的,希望在娱乐中调剂心理,求得平衡。少数是堕落型的,即以吃喝嫖赌等不正当活动来刺激神经,满足物欲。对于知识分子,闲暇时间与工作时间常常边际模糊。脑力劳动过程常不因走出工作场所而停止,具有较大的弹性。脑力劳动创造性要求越高,工作时间的弹性特征越明显。霍布斯称“闲暇是哲学之田”^⑤。“惜时如金”便成为知识分子共同的时间观。闲暇时间变为再学习,丰实自身,进行新工作的准备阶段。所以发展型、积极型便成为这一社会阶层利用闲暇时间的特点。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这样的闲暇时间是一种“财富”。消费闲暇时间的

过程,实际上是生产的延续,或进一步扩大再生产的前奏。

三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谈及我国人民的生活方式,我们更多的是关注物质消费水平的提高。社会主义如果不能迅速地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自然不能说真正充分发挥了制度的优越性。特别是在我国原有经济文化水平相当落后,在“老、少、边”区温饱问题尚未充分解决的情况下,不把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放在首位,就很难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但如果因此而以为,我们目前生活方式中存在的问题,只有一个消费水平太低,物质生活资料人均占有太少,那就有失偏颇了。经过解放以后四十多年的努力,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十几年艰苦奋斗,我国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已进入温饱型。贫困型居民已由 1980 年 10% 以上,下降到 1990 年的 3.6%。城镇居民的 28.1%,农村居民的 15.1%,进入丰衣足食,吃穿有余的小康型生活^⑥。社会生活方式已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既提出了新的发展要求,也表现了新的发展趋向。消费结构开始由单纯物质型向物质文化型转化;生活节奏由慢速低效向快速高效转化;交往方式由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化。人们不再用单一几项经济指标衡量一个社会的发展状况,而采用一系列指标系统分析社会运行状况。发展教育事业、改变生活方式已成为一种社会共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强调指出:“在创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同时,要努力在全社会形成适应现代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要求的、文明的、健康的、科学的生活方式,摒弃那些落后的、愚昧的、腐朽的东西,要努力在全社会振奋起积极的、向上的、进取的精神,克服那些安于现状、思想懒惰、惧怕变革、墨守陈规的习惯势力。这样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和物质文明建设的巨大力量。”

发展教育,促进生活方式现代化在今天决不是一座可望不可及的空中楼阁,而是已经具有一系列的现实可能和客观条件。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改革事业的不断深入,全民重视教育,全社会办教育的风尚正在逐步形成。特别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改革开放的发展,劳动者在获得大量实惠的同时,正承受着一种内在的压力。能否在商品生产中立足,对于一个企业,一个劳动者都将是严峻的挑战。在人们告别“铁工资、铁饭碗、铁交椅”时,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只有不断接受教育,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只有依靠科技教育,才能事业发达。在一些改革开放较早的地区,如深圳、珠海,白天打工、晚上学习已蔚然成风。企业文化、企业形象的内涵不断被拓宽,员工素质再一次被视为决定企业盛衰的关键。无论是工业还是农业、服务业,社会竞争的压力,正逐步内化为劳动者学习的动力。当然对教育的渴求程度不断提高,要真正形成一种风尚,并改变传统的生活方式,还有一个相当的过程,指望在极短时间里一切都焕然一新是不切实际的。断言我国生活方式现代化进程只能由物质享受的车头带动,也是完全错误的。发展教育、重视教育是我们社会制度的优势所在。也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经过十几年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我国的社会经济实力不断加强,综合国力进一步提高,这一切也给不断增加社会教育投入奠定了物质基础。1991 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已达 19580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 1980 年增长了 1.4 倍,平均每年增长 9%。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 1980 年增长 1.08 倍,在此基础上,有些专家测算,在本世纪后几年中,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年平均增长 6% 左右,是完全可以达到预期的翻两番目标的。在这个过程中,教育投资若也能保持相应的

速度,到本世纪末,人均教育费用的社会投入量即可增加40%以上。这样一个社会投入水平能极大的改善办学条件,扩大社会受教育面^①,使现今每万人中大学在校生人数比例由18人上升到30人左右,使社会成员一半以上接受初中以上教育。只要国内外形势不发生重大变故,只要各级政府真正重视教育,只要我们始终抓住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任务,这一中期目标是完全可以达到的。

发展教育,仅靠国家、企业投入显然是不够的,还必须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据统计,1991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已达710元,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为1570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两项分别比1980年增长1.4倍和56%。同期,食品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例,农民由61.8%下降为54.9%,城镇居民由56.7%下降为54.3%^②。到1991年底,全国共有存款9110亿元^③,其中,城镇居民存款7420亿,人均1027元,农民存款2005亿,人均224元。此外还有2000亿左右的闲置资金,流散于社会。这一切都说明,我国居民的个人收入中扩大教育支出,完全是可能的,可行的。改变教育费用完全由国家独包的状况,调动国家、集体、个人三个层次办学的热情,也是一条切实可行的方法。只要控制一定比例,是不会更多地影响我国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

发展教育,特别是成人教育除需要有一定的物质条件,还需要有时间,要使受教育者将一部分时间投入学习过程。生产力水平提高,必然带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闲暇时间的延长。在城市,虽然八小时工作制仍然是主流,但实际利用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如有的行业实行的四班流转形式,弹性工作制形式,休假制度等,都使得劳动者的在岗时间减少。社会服务网点增加,职工家用电器增加,交通手段改善,家庭人口减少等因素又使得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在悄悄缩短。这些都必然带来劳动者闲暇时间的增加。前几年,对北京市1200名职工的抽样调查表明,每人每天平均闲暇时间为二小时半,并仍呈上升趋势^④。这是一笔为数不小的“财富”。在农村,一部分农民进入乡镇企业工作,或进入非农业的第三产业。自1979年以来,已有9000多万农村劳动力发生了这种转移,使其实际身份发生了显著变化,并拥有了与城镇职工相当的闲暇时间。另一部分农民则由于农业生产集约化、现代化以及各种社会服务业的增加,用于田间劳动的时间也大为节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生活方式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过去。劳动者闲暇时间的增加既给其本身的学习、教育提供了客观条件,也为其后代的教育提供了保障。所以其意义并不是单向的。

教育机构数量的增加,教育质量的提高,又给教育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以成人教育为例,十几年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成系列。1990年在校接受教育者已达170万人。不断教育、终身教育,在我国正被越来越多的人所重视。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在全国范围已基本具备条件。1991年7—11岁儿童小学入学率已达97.9%,小学升初中率达77.7%。教育机构现在基本上具备了完成这一大规模社会教育的能力。高等教育虽然限于种种条件,不可能在较短时间里与发达国家或许多中等发达国家的普及水平相比,但是,仅现有的规模,若能再适当增加投资,加强管理和发展专业,仍有极大的潜力可挖。如果能将高等教育师生比例,由1:5左右上升到1:10左右,与美国(1:11)、英国(1:11.2)、加拿大(1:13.4)、法国(1:25.3)等国相似,就可以多吸收近1倍青年入学。

总之,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决不只是一个单纯增加消费量的问题。国外许多学者提出过多种模式,国内也有不少人对此加以研究。若加以综合,可以发现其中最核心的内容是进一步促使人们成为自由人。马克思曾把未来社会称为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

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①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自由人的生活方式。这既应当是人类生活方式的特征,又应当是人类生活方式发展的目标。其基本标志应当包括人能自立地支配自身,自觉地支配客体。人不仅是社会的主人,自然的主人,而且是自己本身的主人。所以,现代化的生活方式远不止是一种消费方式,更重要的是一种新的价值观念、新的生活目标。而要真正理解这种正向我们召唤,又尚待我们努力的目标,并实现之,离开了教育(无论就广义而言还是就狭义而论)都是不可想象的。

注释:

- ① (苏)伊·谢·康主编《伦理学辞典》,第 252 页。
- ② 宋林飞著《现代社会学》,第 431 页。
- ③ 《半月谈》特刊《1990 年时事资料手册》,第 14 页。
- ④ 世界银行《1990 这世界发展报告》。
- ⑤ 世界银行《1989 年世界发展报告》,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编。
- ⑥ 《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收支调查资料》,第 7 页。
-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 82 页。
- ⑧ 《中国社会科学》1992 年第一期,第 108 页。
- ⑨ 《中国社会科学》1992 年第一期,第 35 页。
- ⑩ 《半月谈》特刊《1990 年时事资料手册》,第 14 页。
- ⑪ (美)詹姆斯·W·鲍特金著《全球竞争及对策》,第 13 页。
- ⑫ (英)丹皮尔《科学史》,第 693 页。
- ⑬ (美)科恩著《论民主》,第 116 页。
- ⑭ (美)戴维·波普诺《社会学》下,第 291 页。
- ⑮ (英)霍布斯《利维坦》,第 539 页。
- ⑯ 《中国社会科学》1992 年第一期,第 107 页。
- ⑰ 《中国社会科学》1992 年第一期,第 110 页。
- ⑱ 《中国社会科学》1992 年第一期,第 107 页。
- ⑲ 国家统计局《关于 1991 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报告》。
- ⑳ 《体育科学》1984 年 4 期,第 6 页。
- ㉑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 273 页。